

导论 在开放中建设强国经济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了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从全面小康的内涵看，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也必然意味着国际经济地位的大大提升，并以一个经济强国而屹立于民族之林。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表明，中国需要以全新的理念探索强国经济的特征，以新的战略全面构筑强国之本。

一、经济全球化、要素流动及其收入决定

经济全球化的首要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因此，对经济全球化下发展战略的考察应当从要素的变化及其所决定的新规律出发。

当代国际分工体系是要素禀赋结构的体现。要素禀赋论对当代国际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普遍以此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依据。由于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处于工业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劳动力与资本，因此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基本国际分工格局。自然资源也是工业化经济的重要要素，在一部分国家中也形成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应当承认，这种利用本国富裕劳动力要素发展出口的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曾经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不仅缓解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而且增强了进口能力，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要素价格决定于要素稀缺性的要素收入论，生产结构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禀赋论，这两个理论在全球化经济中至少发生了

几个重大变化。

第一，要素收入的分配转变为国家之间的分配。经济学上的要素收入论是一般微观经济分析的原理，它并不涉及国际经济问题。因此，它指的是某一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和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分配关系。从国际经济分析来讲，收益仍然是要素所有者的，但是不同的是每一要素所有者都是一定国家的所有者。要素所有者转化为以国家区分的要素所有者群体。当要素拥有情况的差异表现为国家差异时，要素收益的差异也就成为国家收益的差异，要素收入分配也就成为国际分配。

第二，开放经济改变要素供应量从而改变要素价格。在要素收入论中，决定要素收益差异的要素稀缺性是由一国的要素总量所决定的，在封闭经济中和在一定时期中这是一个不变量，从而也就相对决定了要素的价格。全球化使国民经济成为开放经济，使要素流动具有国际性。

第三，要素收入的国际分配是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的。一国的充裕要素流到另一个该要素稀缺的国家，获得比在本国更高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资本从资本富裕国家流到资本稀缺国家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也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入。

第四，要素的国际流动不会完全消除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要素的国际流动会改变各国原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的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的价格，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对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一项著名的推论，是要素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即要素国际价格差别的消失。这一推论是完全科学的，但这只表明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表明只要有要素的国际流动就会消除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别。正因为有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别，才会有可持续的国际要素流动。一方面，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要素需求结构，使要素差异不可能消除。另一方面，财富积累的国际差异不断扩大发达国家的资本富裕度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稀缺度，使国际要素流动成为持续的需要。

第五，全球要素价格由全球要素的稀缺性所决定。在全球化经

济系统中，一定的时刻具有相似于封闭的国民经济的要素比，从而有一定的要素稀缺性和要素价格。

从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分析中可以看到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对采用传统型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是相对不利的。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全球化挑战的严峻性在于：

第一，要素结构是由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它不是在短期中可以轻易改变的。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研讨中，经常有人提出实现动态比较优势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地位。这一思路显然是正确的。但是，新的产业优势必须基于另一种要素供给。于是问题又归结为要素供给的改变。但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环节。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资本流动的相对便利，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可以改变资本不足的状况，但其中的收入分配关系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不论采用国际贷款还是采用直接投资的办法，资本总是要获得其相应的收入。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各种新要素的稀缺性大大增强，拉大了要素分配的差距，而且这些要素有些难以流动（例如国民经济信息化、经济制度），拥有这些要素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特征，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第二，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参与全球化体系的利益的大小。由于全球化经济遵循按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的原则，而发达国家拥有主要稀缺要素，因而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第三，全球化挑战的核心在于与全球化同时发展的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论是从知识经济的特征上提出的。显然，知识经济不是美国的专利，但现实却显然由美国所主导。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在拥有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挑战归结为知识经济的挑战。

第四，由知识经济所决定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知识经济是人类生产力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后的又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跨越。正如在工业革命中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曾长达数百年一样，在知识经济革命中落后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难以

改变。

第五，要素收益的国际分配规律中存在着发展的国际差异的正反馈机制。可以发现，除了发展战略上的原因外，由知识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是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结果。然而可怕的是，知识经济核心要素的国际差异会由于收益的国际差异而进一步增强。因为这些要素本来就是一国较发达而有更多教育科研投入的结果。按要素稀缺性的国际分配会加强国际财富积累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核心要素上积累的速度。

二、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要素分布及其影响

强国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经济。

生产要素及其收益的分析方法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化经济和知识经济分析提供一种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仅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发展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第四，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正是这一网络使整个全球化生产的增加价值结构向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

知识经济对于工业化经济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导致了经济运行中占主导地位的要发生重变化。如果我们把生产要素的概念从微观的生产过程扩大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那么各种决定和影响经济过程的有形无形因素作为广义上的要素，可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知识经济对中国的不利影响。这些要素包括：知识型劳动力要素、表现为专利权等的知识要素、经济与技术信息要素、

作为资金供给能力与市场稳定能力的金融要素以及社会的创新能力要素等等。在工业化经济中，这些要素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或者资本的一种附属特性，并在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中不具有独立地位。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却对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的根源。作为知识经济主导性要素的金融要素与信息要素基本上只掌握在最发达国家的手中。在金融对经济的引导作用日益显著、信息对经济的核心地位日益显著的今天，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现代经济的两种主要产业，哪个国家先发展了这两种产业，哪个国家就率先发展了现代经济，从而也就掌握了国际经济的主动权，占据了国际分工的主导地位。金融不仅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条件，而且决定了财富的再分配。因为不断涌现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撑，而在金融全球化中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国家又通过金融渠道不断汲取着其他国家通过制造业生产出来的财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决定了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从而决定了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知识型劳动力的数量方面，在研究与开发能力与水平（如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方面，在形成知识要素的基础即教育方面，以及在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等各个代表着知识经济水平的各个方面，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差距是巨大的。与要素结构不均衡相联系的，是国际分工结构的不均衡。新兴的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只掌握在一部分国家手中。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不再是浅层次上的产业的国际分工，而且包括大量深层次上的产品分工，即一产品的各个零部件由各国生产制造。但是，发达国家往往控制着具有核心技术意义的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而发展中国家即使形成了最终产品的生产线与生产能力，有最终产品较高的本地化水平，也仍然不拥有对产品的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地位，现象上看是它们的发展水平低，进而影响其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等，深层次看是它们的要素禀赋地位，即要素禀赋结构的弱势地位。弱势地位的意义在于，在一定的世界产业发展水平下，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只适合

于已成熟甚至落后产业的发展要求，而先进的、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的核心要素则主要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工业经济时代，代表现代大工业的资本要素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只靠拥有的劳动力要素而处于要素的弱势地位。20 世纪末成功的发展战略使一些国家走上了新兴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少国家发展起了现代化大工业。但是相对于已经走上信息化经济的世界来说，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仍然是代表成熟的夕阳产业的生产要素，缺乏代表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因而仍然处于要素的弱势地位。

三、开放型经济强国的三大总体战略

通过对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发展新特点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了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适合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显然不能再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现有富裕要素的发展战略，而应是争取获得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新要素的发展战略。这种新的总体性战略包括三个方面：

1. 建立分工与竞争优势的要素培育战略

全球化条件下知识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是，知识经济的主导要素严重缺乏。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提出经济发展新的要素培育战略。要从知识经济广义要素的思维出发规划国际要素的利用和引进，而不是单一地考虑资本。资本固然是知识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知识经济的核心不是资本。单一地考虑资本只能发展工业化经济，或者知识经济中的加工型经济。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利用，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内外要素组合必然包含着按要素稀缺性分配收益的规则。对本国劳动力要素的利用不只是把他们作为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劳动力，而要从知识经济的结构特征上看劳动力的新意义。不仅要立足于引进外部要素，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本国的稀缺要素。发展战略的重点不应只是利用外部要素，而且要注重创造自身缺乏的新经济要素，以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的弱势地位。

在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中，中国应当以现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依据，并且从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现实出发，确定要素培育的有效战略。

要改变基于比较优势与要素优势的传统思维。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优势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理论只能导致中国在传统制造业中找到位置而不可能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国家竞争优势不同于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既不以劳动力要素为依据，也不在于说明这种优势的比较性即相对性。国家竞争优势说明的是一种绝对优势，而不是相对优势；在于说明超越竞争对手国家的因素，而不在于证明贸易能否发生。国家竞争优势也不同于以传统的微观意义的生产要素为基础的要素禀赋优势，因为它不仅强调要素优势的可变性、可培育性，而且不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要素的可培育性和流动性改变了要素禀赋优势理论的基础。

要注重基础要素的投资，为经济进步创造基础条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育需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培育来实现。在生产要素的培育上，国家和企业应当具有不同的分工。基础设施、经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是高级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却又是企业不愿或不能投资的要素，所以应当是国家的投资重点。相反，专门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是核心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是其利润的来源，企业更会注重这种生产要素的投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具有风险大、回报率高的特点，正符合企业投资的性质。“当国家的生产要素与国家竞争优势关系密切时，通常特别容易受到其他关键要素的影响。例如每个国家在运输系统、中学教育等方面的情形都不同，这与政府公共政策走向、投资比重、预期标准以及研发机构的参与程度都有关系。这些一般型生产要素虽然不足以创造一个国家的高级产业，但是高级和专业型的生产要素却不得不以它们为基础。因此持续投资一般型要素是国家经济进步最基本的条件。”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培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美] 迈克尔·波特 (Michael E. Porter) 《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5 页。

应当把适合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加速培养成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当然作为大国，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是多层次的。劳动力的结构也将是多层次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在整体上继续把中国作为劳动力富裕大国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作为战略目标。我们应当允许地区差异，但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则在于结构提升。

要创造强有力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级生产要素的形成。尽管企业有投资高级生产要素的动力，但现代技术的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于风险投资的推动。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是促进生产要素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这是一种以现代金融推动现代技术进步的机制。中国政府应当努力促进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并在规范化下加速成长；应当促进风险投资进入与退出机制的市场的形成，从而更有效地吸收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以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应当完善金融体制，特别是发展风险投资机制。创造支撑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制度，是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创新的关键。这种风险投资既不能靠政府，也不能靠生产企业自身和传统金融，而需要靠风险投资者与现代企业家的结合。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市场作为投资的进入、退出渠道，科技人员作为创新者，企业家作为要素组合者，都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条件。其中作为制度的关键是金融对产业的支撑。要增大科研投入，创造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无论是从产出结构看，还是从出口结构看，我国近年来产业的技术含量在提升。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外资形式带来的技术流入起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在我国的 GDP 增长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外资拥有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只有拥有更多自主的知识产权，我们才能在经济增长中实际拥有更大的利益。高级生产要素由市场机制和企业来培育，丝毫不降低政府的作用。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仍然需要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推动。但是政府仍然应当分清与市场的关系。

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构建特定的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竞争

优势不是均衡的，而是体现在某一特定部门的。国家的战略在于发现这种特长形成的可能性，从而加强培育。企业最善于发现市场机遇，并投资于开发。产业显著的发展前景会导致对专业人才需求的提高。这时，政府应当致力于投资和支持相关发展，如更多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专业的市场信息机构和媒体等。政府应当使同类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通过促进行业发展中的竞争来促进发展，这也会使相关生产要素得以更有效的利用。政府应当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以为专业性的生产提供条件。政府工作的重点是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以构造共同的供应、技术和环境条件。要致力于建立与某一特定产业相关的关键要素，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基础上的国家竞争优势。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企业与政府功能的区别。企业可能创造关键技术，发现关键产品的市场前景，但是从企业的创新到一个国家在某一产业上的整体优势，需要产业集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发现这种集群的需要，投资于其中的薄弱环节，并使之集中于某一个地区。

2. 实行以跨国经营为内容的全球组合型企业战略

走向跨国经营，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国国内市场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但是全球化经济作为要素优势组合的发展原理表明，中国缺乏全球化经济的主导要素，必将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格局下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知识经济的生产要素特征表明，中国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如技术、金融、信息、人才等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也存在着资源的约束。这要求我国从全球范围中规划资源配置，包括引进和进行全球性组合。全球经营已是当代各国先进企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数国家不采用这种模式必然处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失去活力，失去优势，失去竞争力。与注重跨国经营的企业相比，只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甚至只知道加工生产和产品出口的企业只能算作现代小生产方式。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开拓国际空间的阶段，这是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指沿海地区）、某些产业的生产能力（主要指制造业）的迅速扩展等所决定的。对于目前几乎还没有真正起步的中国企业来说，跨国经营似乎是一个遥远

的理想。但是，如果不把理想变为现实，那么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只是处于被动地位。

跨国经营道路的开辟，也与全球化要素的培育密切相关。

要加速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知识能力的企业家。跨国经营是一种全球性的要素组合，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要素组合，把资本、劳动力、新型产品、特有技术、市场、营销渠道等等组合在一起。跨国经营的惟一区别就是空间的扩大，跨越国界的要素组合。因此，把企业家的一般能力与素质变为掌握国外的、跨越国界的和超越制度与文化差异的能力，国内企业家也就成了国际企业家。有了国际型的企业家，就有了跨国经营的最重要条件。当然国际型的企业家首先是会在国内市场中成长的。在近期我们也需要借助外籍国际企业家和海外学子来加速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要尽快消除企业跨国经营的制度障碍。除了企业家缺乏以外，中国的最大弱点在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已显现出来，更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在国有企业形成跨国经营能力之前，重点可放在国有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国际合作上，借助国际跨国大公司走向世界。同时，要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走向世界。在资本项目逐步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要在有效监管下为对外投资提供便利。

要通过与国际大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走向世界。在中国缺乏全球化企业网络基础的情况下，我国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化的收购兼并和投资等资产经营活动走上跨国经营，可能是一条比较现实的道路。大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一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地区总部等，都为中国企业与其合作到其他国家去进行投资创造了条件。

3. 实行以世界市场为对象的全球规划型国家战略

“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是一个从世界经济整体格局下规划本国发展道路，以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来实现本国发展的战略，而不是仅仅利用好本国优势要素和外部市场的战略。要把握与利用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体系这两个体系。要把本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不仅要接受经济

的全球化挑战，而且要在全球经济中寻找我们的发展空间。

走向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型。要素培育和跨国经营解决的是发展战略的微观层面问题，而全球规划则是解决宏观层面问题。在实际操作上，要素培育和跨国经营主要是在政府创造的环境下由市场来完成，而全球规划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跨国经营从事的是全球要素组合，而国家所承担的则是基于全球经济整体的本国综合战略。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要素培育和跨国经营是全球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的全球要素组合与国家的全球要素规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于，在核心手段上，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中推行企业的战略，而国家则是在全球发展格局中为本国寻找发展定位与国际地位。在战略目标上，企业在于以跨国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中获得和培育本国稀缺要素以获得更有利的产业分工和经营利益，而国家在于改变本国在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中的要素弱势地位，以实现更有利的发展与增长，实现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有利地位。

国家的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与出口导向型战略有着重要的区别，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于通过有限的单向开放，引进外资，利用优势要素，发展优势要素密集型产业来拉动经济，而国家的全球规划则在于全面双向高度开放，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体制上与国际接轨。出口导向型战略所规划的是出口增长能力和本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而全球规划型战略所规划的则是改善国家的要素结构和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战略地位的提升。

迄今为止，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战略，更具体说是发挥富裕要素比较优势（劳动力或资源）的战略。这些战略都是从本国现有基础出发的，从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意义出发的，而不是从生产要素高度流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新情况出发的。开放战略普遍具有单向性，注重激励出口，引进外资。可以说，对外部争取的是产品市场，而不是投资机会；规划的是本国要素在本国的发展，而不包括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这样的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世界银行约瑟夫认为，全球化从几个方向冲击发展，对国家政

策而言最重要的是：贸易增长、资本流动和金融能力、移民、IT和网络、技术扩散。对于那些只是部分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来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了短期资本流动引起的动荡风险，但也因此失去了利用全球化内在的资源、能量和观念的机会。他认为，同时通过上述几个渠道进一步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与政策措施和制度变革相结合，可能是扩大关键要素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收入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对增长源泉的研究发现了几个与所有国家（穷国或富国）相关的因素，其中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集聚效应、外部性和制度。发展中国家能否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取决于解决上述变量的政策。运用融入全球化的综合性方式，并由良好政策加以管理和支持，就能放大各项增长促进措施的效应。

这一分析表明，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展战略需要考虑的，既包括广义要素的培育和发展，包括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要素的“集群”效应，也包括融入全球化的整体安排。

中国的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2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在总体上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小康。但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中国发展战略的最大特点在于巨大的地区差别必须是整体发展战略的基点。当中国的沿海地区向世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成就时，大陆相当广阔的地区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因此，中国的全球规划型发展战略首先是基于全国整体的规划战略。关于国际分工利益分配的全部论述旨在证明单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不利性。然而这绝不等于可以得出结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都应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战略目标。全球规划战略提出的是沿海开放地区参与全球化的战略要点，但不是整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的全部，更不是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全部。任何一个发展战略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国情之上。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就业问题不论是现在还是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是严峻的。地区发

① Shahid Yusu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June 2001.

展的差距是显著的。

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三大战略，也就是强国经济的三大基础，即拥有现代经济的主导要素、拥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企业形式、拥有面向全球化经济的国家规划。

四、建设强国经济的若干战略重点

从开放走向经济强国，建设强国经济需要突出抓好以下一些战略重点。

1. 继续发挥体制优势

中国是一个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改革而成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差异，由于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中国的体制模式是一种“区域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一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这一体制是中国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政府在经济中的过度参与既可能带来经济活动的高效率，也可能影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于更有效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在于符合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对一个成员方的体制要求，但是却不意味着要改变一个高效的、有能力的和以发展经济为职责的政府管理体制，因为正是这一体制是中国实现发展赶超的重要条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在于创造市场运行的条件。从对外竞争和国际分工利益的角度看，则是为社会培育更多的高级生产要素，即知识型劳动力、科技人员、专利与专有技术等，以改变一个目前主要靠富裕的然而却是低水平的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在市场力量下，中国只能以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只有增加高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才能以新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在一个新的水平上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实行参与国际分工的二元化战略

在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中，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最为显著。“中国制造”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物美，因而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是中国需要改变当前单纯依

靠劳动力富裕参与贸易分工的战略，以发展的二元化实现经济强国目标。

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跨国投资的结果，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的结果。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标志。迅速提升的出口大部分来自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前者是跨国公司生产点的国际转移，即中国取代其他国家或地区承担起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后者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和价值链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产，也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意义上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来自中国的产品”不等于“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人制造”。因此，与其说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不如说世界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其生产制造的基地。

以经济强国为目标的中国不能仅仅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与落后的农业国相比，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是一大进步。不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是否已经成为现实，不论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在国际产业转移下和在外资大量流入下成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毕竟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和利益分配相对不利地位。中国走上了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获得了发展的实绩和效益，但是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即使真的成了世界制造业基地，按目前情况看也只能说是世界的“加工场”，因为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而不是从技术开发到营销的全过程。而就制造业整体看，无论是总体比重还是产品的高端部分目前仍然在发达国家。

客观地说，中国是不得不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因为外资流入是形成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的最主要条件，跨国公司处于国际生产配置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也是不能不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因为中国最主要的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加工是中国现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最现实方式。中国只有发展起现代知识经济，才能说

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向建设一个现代经济强国迈进。从长远看，中国也必须在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既是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一种警示。从中长期看，中国应当改变单纯的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中国应当从一个大国，特别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现实出发，以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这种多元化战略的主要特点是，沿海发达地区应当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在扩大开放和与沿海合作中承担起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制造业基地的职能。

3. 提升出口贸易战略，改变廉价竞争方式

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持续获得了高速增长，体现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但是，仔细分析中国的出口增长结构却发现，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和中国产品以廉价方式竞争是两个重要原因。这与中国的经济强国目标显然是不相吻合的。

迄今为止，出口增长率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种刺激出口的政策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开放初期，在国家外汇储备水平较低，出口收汇不能满足进口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必要的；从就业来说，出口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然而，低价竞争毕竟是一个利益外流的出口格局，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对出口增长率的追求已经成了各地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出口增长中的实际国民利益已经被放到了一边。在宏观层面上，就业的创造不只在于出口，而在于贸易的顺差。除了发展思路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出口竞争即对外竞相削价是造成整体出口价格下降的体制原因。在吸引外资中的劳动力低价形成了出口优势，也降低了出口收益。当中国为自己的劳动力廉价而自豪时，却忽略了其中付出了国民的福利代价。从微观上讲，是劳动者的低工资；从宏观上讲，中国是在 9 亿农村人口养活 4 亿城市人口的经济结构下维持城市劳动力低成本的，其中付出的是城乡差别扩大，农村发展缓慢的长期成本。

因此，中国需要改变依赖实物产品的低价竞争战略，需要从外贸战略与外贸体制等多方面入手。需要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经济。不

只是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只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富裕要素，而且要培育高级的生产要素，创造新的优势。简而言之，中国需要基于全球化的对外经济发展规划。

4. 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发展对外投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以其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吸收了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为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

中国向外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开放了具有无穷潜力的国内市场，创造了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在财税政策上不断地让利于外资。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土地价格使世界资本和技术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了高收益，比它们在其他国家更高。这种更高的收益既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所创造的生产率，也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土地价格和政府税收的让利，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活力。二十多年来中国正是这样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各种闲置生产要素被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得到引进，落后的管理方式得到改善，就业水平大大提高，中国就是这样实现自身增长的。

外资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中国也仍然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但是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却使人看到，决定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除了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与前景外，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无限制让利，而造成这种无限制让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地区间在争夺外资上的激烈竞争。除了不断改善投资软环境、硬环境和降低商务成本等正确做法外，地区间争夺外资项目的方法集中在税收减免和地价乃至其他种种让利上。因此，在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背后，是中国各地不断加码的、过度的优惠政策，甚至是不适当的竞争手段。外资利用了中国这种地区间竞争获得了超额国民待遇和过高的优惠，再加上本来就容易发生的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行为因为我们放松监管而更加严重，中国利用外资的效益被明显减少了。

在获得了利用外资的巨大成就后，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提高引进外资的效益。在利用外资上同样不能走数量型增长道路。在这一问题上，关键是消除不合理的地区竞争，加强地区间的协调与合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上，放在政府服务上。利用

外资要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相结合，与产业发展战略相结合。在这一点上，我们更需要适应全球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既引进外资，也对外投资。要在全球范围中规划我们的资源、生产与市场。要利用与更不发达国家的落差对这些国家投资，带动我们成熟产业的市场扩展与产品的系列成套出口。总之，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而不只是请世界企业来到中国。

5. 建立具有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

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金融经济，现代经济强国也必然是一个在金融体系上强大的国家。因此，构筑强国之本的努力包括全面建立一个强大的、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本国的资源配置，而且能够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外部金融资源；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国内市场调节，而且能够吸纳外部冲击，有效地进行开放条件下的金融调节。在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下是不可能建成经济强国的。

一个坚挺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是当代经济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提高，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和国际硬通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目前的汇率制度走到未来的汇率制度是一个过程，即一个新机制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在什么幅度上去调整现行汇率水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要不要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的问题。相对不灵活的汇率机制可能导致一个时期汇率低估，这种低估使出口产品有了降价空间，也使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占更大份额，从而在出口和外资流入两方面都形成国民经济的利益损失，还可能提高国内成本和影响出口。经济全球化正是这样通过本币汇率分配着利益。从近期看，中国应当探索如何以更合理的汇率水平获得更大的利益；从长期看，中国应当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灵活调节能力的汇率机制来改变这种局面。货币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并不只是汇率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汇率政策与体制应当与国家全球战略相一致，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相一致，而不只是为贸易出口服务。中国需要一个灵活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汇率机制。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汇率体制的特点是：灵活反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同时